

電郵:tkporg@takungpao.com 傳真:28345135

# 建築物「短命」痼疾何在？

許曉明



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近日透露，中國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築量最大的國家，但這些建築只能持續25-30年。資料顯示，英國建築的平均壽命達到132年，美國的平均壽命達74年。以人的壽命來做參照的話，英國建築是高壽，美國建築是正常，我國的建築就是短壽、早逝了。建築物如此普遍的短命，足以令老百姓目瞪口呆。

## 平均壽命三十年

一方面，我國是新建建築最多的國家；另一方面，我國建築普遍短壽。兩個反差鮮明的紀錄，揭示了一系列令人驚心的事實：「出生」的新建築每年消耗全球一半的鋼鐵和水泥；「死亡」的舊建築和新建建築施工，製造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建築垃圾，佔到城市垃圾總量的30%-40%；企業和個人購買的是「健康」的房子，不料總體都是短命的建築，距土地使用70年周期還差一大截。

吞噬了全世界最多的建築資源，製造了全世界最多的建築垃圾，耗費了國家和個人、企業驚人的資產，短命建築之病必須及早根治。住建部領導表示，現在政府號召房地產開發企業提高建築質量，將目前30年的建築平均壽命延長至100年。號召令人期待，然而治愈重病在身的建築業，號召房產開發企業不是一劑良方。

不怕房產企業搞鬼，就怕建築部門監管不作為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建築企業有違規操作的「原罪」傾向，這不足為怪。追逐利潤是企業生存的根本動機，為了謀取利潤最大化，企業總是在違規操作的誘惑和依法經營之間徘徊。如果，政府監管或者執法到位，建築企業有「賊心」也沒那個「賊膽」，有「賊膽」也沒那個機會。由於建築規劃不合理，或者新舊規劃銜接不合理，地方政府常常前倖而後倖，好端端的建築物經常「意外死亡」，所以連住建部領導都表示，政府部門的盲目拆遷是促成建築物短壽的主因之一。

## 相關部門不作為

因此，從全局的角度來看，不良房產企業偷工減料或者設計、施工不達標，固然是導致建築物質量存在嚴重隱患的成因之一，但一些政府部門的不作為、亂作為才是「癥結」所在。建築部門把守着房屋驗收的最後關卡，果能嚴格把關，樓歪歪、樓脆脆、樓倒倒、樓靠靠哪有生存空間？地方政府拆房、建房的「生意」最大，果能精打細算，哪來那些最短命學校、最短命醫院、最短命住宅？

所以，根治建築短命的痼疾，必須從嚴管建築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抓起，讓不作為、亂作為的政府機構為短命建築「埋單」，讓相關責任人為失職、瀆職「埋單」，織就嚴密的「天網」才能不怕短命建築出籠。

# 空巢老人最可憐

朱國良

這則新聞，讀來一驚：安徽太和縣一位85歲的老人在無人照料的情況下，餓死在家。村幹部面對指責，回答是「誰讓他兒子不在了。」村主任表示具體情況「搞不清楚」。此事經媒體報道後，旋即成為熱門話題。老人之死，讓人想到了空巢之苦。

倚門守望的白髮父母，無不熱望兒女歸家探望。有兒女承歡膝下，在過去曾是老人們衡量晚年幸福的重要標杆。可是如今，工作太忙、單位加班、小孩需要照顧、參加朋友聚會，每每成為子女們不探視父母的託詞與理由。還有情況則如一位名人所言：「維繫家庭的紐帶並不是家庭的愛，而是隱藏在財產共有關係之後的私人利益。」這種行為顯然無益於社會公德和良好社會風尚的築建。

中國目前已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。發達國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時間，中國只用27年就可以完成這個歷程，並且將長期保持很高的遞增速度，屬於老齡化速度最快國家之列。老齡化社會急匆匆而來，空巢老人晚年生活中的諸多尷尬境況，也隨之接踵而至，從以人為本的角度想問題，這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刻反思。

家庭的和諧，是社會和諧的細胞。作為一個特殊群體，老年人需要精神的贍養、親情的撫慰，而來自子女的親情更是重要的慰藉。心理學研究證明，人的親情和交往狀態與其生命長度成正比。讓我們抽出時間陪陪父母吧，工作再忙、事情再多，每周抽時間陪父母吃次飯，聊聊天，並不是難於上青天的事情。即使每天打一個電話問候，看似短短幾分鐘的時間，卻也代表著一種血濃於水的溫情和溫暖，為父母掙去的是一份孝的問候和一種愛的慰藉啊！

# 港台關係要補課挖潛

林修祺

港台關係提高層次及全面發展，對兩岸三地是三贏局面。香港在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合作上所發揮的中介平台作用已下降，香港要補救這方面的弱勢，就必須在港台關係上補課、挖潛，迎頭趕上乃至超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程度。



台灣陸委會副主委劉德勳及主任秘書張樹棟，在3月中先後低調訪港，與特區政府磋商，設立推動港台經濟文化合作的專責機構。3月31日，香港特區政府宣布成立「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」，由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任榮譽主席，行政會議成員李業廣任主席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任常務副主席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、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任副主席。

## 對口兩會創新機遇

台灣陸委會4月2日召開記者會，宣布成立「台灣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」，預定在5月正式投入運作，由前財政部長、現任東海大學董事長林振國任董事長，陸委會副主委高長兼任副董事長，港澳處長朱熾任秘書長，民間董事11人，官方董事10人，包括「經濟部」、「交通部」、「教育部」、「財政部」、金管會等部會副首長。陸委會副主委兼發言人劉德勳表示：期望透過這新平台，台灣之間可以作多元和多層次的交流，加強兩地在各方面的聯繫和合作。策進會未來會處理港台官員互訪事宜，未來港台官員交流互訪的層次會更高。

港台對口兩會定位為民間機構，仿效兩岸海協會與海基會的模式建立和運作，經雙方政府授權後，可直接商談港台航權、司法協助、避免雙重課稅及其他公共政策事務，並簽訂合作備忘錄或相關協議文件。兩會將於數月內舉行首次聯合會議，最優先處理的議題，是今年6月到期的港台航約續約，和兩地醫療衛生合作問題。港台對口兩會的建立和運作，將使兩地高層官員的交流互訪較為便利和暢通，將為港台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創造新機遇，標誌著港台關係邁進全面發展的新時期。

港台關係提高層次及全面發展，對兩岸三地是三贏局面。隨著兩岸實現大交流、大發展、大合作，香港在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合作上所發揮的中介平台作用已下降，香港要補救這方面的弱勢，就必須在港台關係上補課、挖潛，迎頭趕上乃至超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程度。如積極發揮香港政經的獨特優勢，在兩岸人民幣結算中發揮金融中心的作用；爭取香港的旅行社能夠在內地經營赴台的業務，發展兩岸三地一程多站的航空及郵輪旅遊；由傳統上經

質性的中介角色，提升為兩岸政治、學術交流的中介角色，港台搭建的新平台，可成為兩岸另一個政治溝通管道。此外，提升和強化港台關係，有利兩地優勢互補，台灣在高科技產業的設計和研發方面有明顯優勢，而這正是香港的弱項，亟須向台灣取經，推動合作。

## 互補功能必須強化

把港台關係提升至更高層次，推動更廣泛的交流合作，也是台灣方面一直努力爭取的。香港曾是台灣對外經貿的重要平台，在兩岸實現直接三通後，香港雖然不再扮演傳統上經貿性的中介橋樑角色，但是對台灣仍然具有高度的戰略意義。一方面香港以其「一國兩制」的特殊性，對許多大陸台商提供經營與投資的操作平台，另一方面香港以其國際大都會和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，是台灣與亞太區域經濟連結的重要途徑和平台。香港國際化、自由化，以及法治、廉政、效率等方面的優勢和強項，都值得台灣借鑒和利用。台灣方面更認為，在兩岸和平發展、高層互訪、國際空間等政治問題上，香港可以扮演積極的角色。有緣管人士提出，民進黨可以透過到香港交流，作為與大陸發展關係的切入點和突破點。在港台關係提升後，香港特區政府應改變保守作風，放寬民進黨人士的入境限制，積極主動歡迎民進黨的幹部和公職人員訪問香港。

港台建立雙邊合作的新機制，無疑對港台關係產生新動力新機遇，但也帶出一些新問題或新疑慮。例如台灣早就設有駐港機構，包括陸委會、經濟部、新聞局、移民署、觀光局都有駐港單位。本港的貿發局在台灣也有辦事處，特區政府還計劃和準備在台設立綜合性辦事機構，如今港台分別成立對口的「協進會」和「策進會」，形同另起爐灶，那末，「新爐灶」與原有機構是主輔關係抑或平行關係？在機制和功能上是否架床疊屋？在職能上如何整合與分工？這些問題或疑慮都有待處理或澄清。港台雙方當局都要注意，如果新機制的設計與舊機制的銜接不能達到位階提升、功能強化的目標，對口兩會的成立將事倍功半，對港台關係的提升及全面發展助力不大。另外，從對口兩會的人事布局來看，大都是有財經方面的專長，而對港台關係問題和事務未夠全面認識，尤其缺乏政治經驗和政治敏感度，做起來也會事倍功半，甚至遲早會出狀況。

## 新機制帶出新問題

台灣有熟悉港台問題的專家指出，中聯辦主任彭清華曾強調，港台之間可以扮演「先行先試」的角色，但如今港台兩會仍仿照十多年前設計的兩岸兩會模式，不能做到更直接、更官方、更便利，則不但未有「先行先試」的意味，而且仍遠遠落後於兩岸關係的發展。這個批評值得注意。但從兩岸政治關係的現狀，及特區政府的政策水平來考量，港台兩會在形式上比照兩岸兩會是可以理解的，因為一來可迴避政治敏感的官方身份，二來可彰顯平等交流協商的形式功能。只要在實質功能上放開手腳，由對口官員直接商談，由港府政制事務局與陸委會港澳處負責日常聯繫，推動港台關係發展的格局就可提升和放大。

作者為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

# 韓艦沉沒後果仍難預料

李幼岐



東北亞大事，半島風雲新一章。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晚九時四十五分左右，韓國海軍排水量一千二百噸的「天安號」巡邏艦，在韓國白翎島附近約一點八公里海域，即南北韓海「北方界線」南部海面發生離奇爆炸，船尾形成大洞並立即入水，開始沉沒，延至子夜一時左右，全艦沉入海中。出事時，天安艦上共有一百零四名官兵，但馳援的海軍及臨時徵召的韓國漁船，共共救起五十八人，尚有四十六名官兵下落不明。救援中一名漁民不幸喪生，另八名漁民失蹤。在「黃金六十九小時」的失蹤者生還時限後，搜救人員仍無發現，但搜救工作繼續進行。在失事現場三米高的驚濤駭浪下，搜救工作到四月四日才宣告結束，其間在天安艦尋獲一名遇難者的遺體。以上就是綜合天安艦出事十天內最簡要的情況介紹了。

## 各方採取「冷處理」態度

由於事發地點接近韓朝交界水域，且當時有連續約十五分鐘的炮聲（後來查明是韓國海軍「東草號」巡邏艦向北發炮），令外界產生「天安號」受朝鮮海軍襲擊沉沒的猜測。就東北亞局勢及朝韓敵對關係而言，這樣的猜測屬「人之常情」，但此疑感者卻未能提供確鑿的證據。在朝鮮半島是東北亞「火藥桶」的背景下，這種猜測或推論，可以成為「擦槍走火」以至爆發局部戰爭的肇因或「理由」。這一回，非常幸運，各方都「冷處理」，甚至是「不處理」（韓國當然不能不處理）。可見與東北亞局勢有關的各國，在處理突發的重大事件時，都表現出冷靜、沉着和成熟。

除出事的韓國之外，「六方會談」的其餘五國，即中、美、日、俄、朝，對爆炸沉船事件的反應，全部可形容為「沉默是金」。這樣的取態是正確和合理的，因為在查明事件的真相之前，任何人都沒有依據理由挑起爭端。除非是戰爭狂人，可以一口咬定是「朝鮮發動襲擊」，然後立即揮軍大舉進攻朝鮮。

外界或國際社會最關注的無疑是朝韓兩國的態度。朝鮮對韓艦爆炸沉沒事件的反應，除了「沉默是金」，更被西方輿論形容為「一反常態」，因為過往若韓國發生大事，朝鮮總是高調表態，基本上是「罵罵就罵」，甚至多次暗示或公開威脅要動用「核武」，這在國際上被形容為「懸崖勒馬」。朝鮮這次的沉默，不發表任何看法或評論，可能有以下原因：其一，此事的肇因，朝鮮的嫌疑最大，還是「少說為妙」和「避之則吉」；其二，此類事，在查明真相之前，根本說不清，假如作辯白，說「不是我做的」，反而可能被誤會是「此地無銀三百兩」，那就大可不必；其三，朝鮮前階段貨幣改革失敗，民憤民怨甚深，民心相當不穩，此時切忌「搞事」，以保「天下太平」；其四，現階段正是金正日扶持金正銀「接班」的過渡期，保穩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對韓艦沉沒不作任何反應，乃是上上之策。韓國是「爆炸沉船」的當事國，全球政治、軍事觀察家的目光均聚焦於此。當「天安號」巡邏艦船尾爆炸穿窟開始下沉的消息傳到青瓦台總統府，因為不知道是否朝鮮發動攻擊，按照保安程序，侍衛人員立即護送總統李明博進入青瓦台地堡。李明博即時召集國安部門緊急會議，先後共三次，可見其重視和應變及時。當時堪稱「情況不明、眾說紛紛」，其複雜性和決策的困難可以想像。李明博在國安緊急會議上的決策是：「先救人，後調查。」李明博還表示，「沒有證據就不能斷言說此事同朝鮮有關」。

## 沉沒原因有五種可能

專家分析，「天安號」爆炸沉沒的原因有五種可能，即：朝鮮淺水潛水艇（下潛深度幾十米，只能裝一枚魚雷）的魚雷攻擊；遭朝鮮在白翎島、大青島附近所布水雷衝擊；艦尾甲板上所載深水炸彈意外爆炸；艦內所載七十六毫米艦炮的彈藥爆炸；艦艇底部油箱的油氣爆炸。以筆者粗淺的知識判斷，出事海域水深才二十四米，不難撈撈，當船體撈起後，由爆炸裂口的鋼板向內或向外彎曲可知，究竟是外部攻擊或內部爆炸造成。假如鋼板向內彎曲，則可進一步判斷是否由朝鮮的魚雷或水雷惹的禍。假如鋼板向外彎曲，則馬上可排除朝鮮攻擊的可能性。

因為撈撈排水量一千二百噸的船體，要準備足夠的人力、物力及時間，相信半個月、一個月後方能成事。屆時如果判定是朝鮮攻擊肇事，東北亞的局勢大有可能風雲激變。常言道，有備無患。即使可能性不大，有關各方相信都有必要做好應變的預案。

作者為資深評論員



4月7日是世界衛生日，深圳邊防支隊組織衛生隊的醫務人員到蛇口海港，為漁民和當地群眾宣傳衛生常識，送來常用藥品。圖為一位醫生在為群眾測量血壓。

# 「社保稅」需解決五問題

周子勳



日前，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《求是》雜誌上發表署名文章《堅定不移深化財稅體制改革》，文章提到，完善社會保障籌資形式與提高統籌級次相結合，研究開徵社會保障稅。所謂的社會保障稅也稱「社會保險稅」，主要是指以企業的工資支付額為課徵對象，由僱員和僱主分別繳納，稅款主要用於各種社會福利開支的一種目的稅。

事實上，我國關於「開徵社會保障稅」提法早在1996年就有，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「九五」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》中就已經提出，要逐步開徵社會保障稅。但鮮見主管機關高官表態。此次謝旭人首次明確提出研究開徵社會保障稅，引起了社會各界強烈反響。

## 本質是「費改稅」

某網站的投票中超過七成的網友反對開徵，理由是開徵社會保障稅會增加個人負擔。有網民表示，開徵社會保障稅是用來調節收入分配，倒不如在此之前先對股市、樓市投機者開徵暴利稅。還有人說，既然有社會保險保障個人，又為何要社保稅，這樣兩種分化會更加明顯。

稅務專家則認為，這種擔心完全沒有必要，開徵社會保障稅的本質是「費改稅」，並不會增加個人負擔，無論對完善社會保障的籌資形式、提高社會保障統籌級次，還是從更好地發揮稅收調節收入分配作用的角度，社會保障稅的開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。

儘管目前開徵社會保障稅還存在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，但種種跡象表明，社會保障稅的開徵已經蓄勢待發。何況，社會保障稅已成為西方國家的主

要稅種之一。目前，全世界近200個國家裡至少有132個國家實行社會保障稅制度，這種制度以徵收社會保障稅的方式籌集社會保障資金，並在全國範圍內統籌。所以，我國開徵社保稅的設想符合我國社保事業發展的需要。

不可否認，將現在的「社保費」改為「社保稅」是一種進步，能將納稅人的福利保障提到法制的高度。但現在的問題是，政策的推行並不是理論上說說就行的，需要面對很多問題。目前看來，開徵社會保障稅必須理清以下幾個問題。

第一，從歷史層面看，我國社保基金存在巨大的歷史欠賬。據了解，世界銀行1997年估計為當年GDP的46%至69%；一些經濟學家的估計為當年的71%至94%不等；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的估計更高達145%。即使假定隱性負債只佔中國1997年GDP的30%，其總量也超過2萬億元。如果按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當時的估計高達145%推算，將高達10萬億元左右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最近認定為2萬億元。如果現在強制性開徵社保稅，是否意味著這是要全民來為歷史和體制還債呢？

## 完善社保制度

第二，從制度層面看，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建立，社會保障制度還存在二元結構，而且由於是各省統籌社保制度，徵收標準和支付標準也不一。在這種背景下，如果開徵社會保障稅勢必會遭遇一系列問題。譬如各地社會保障稅徵收標準和支付標準如何定？稅制如何設計？稅率如何界定？養老保險原有的空賬問題如何解決？社會保障稅收入是否全部納入財政管理？等等。所以，在缺乏健全和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的前提下，應謹慎開徵社保稅。

第三，從公平層面看，開徵社保稅必然會牽涉

到多個利益集團彼此之間的利益分配格局。而正是由於這些強勢利益集團的存在，才導致了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。目前，強勢利益集團的職工，保障齊全，福利優厚，而一般企業的職工，很可能連最基本的社會保障都沒有。在這種強勢之下，開徵社保稅也很難解決社會公平問題。當然，由於地方經濟發展不均，收入差距大，企業也沒有按照社保政策要求，百分之百為職工參保，而是有選擇的參保。目前，經濟發達地區好些，經濟欠發達或落後地區參保率就更低，有的地方醫療保險在職工中基本沒有啟動。所以，「費」改「稅」後，資金將由地方統籌變為全國統籌，若「一刀切」從中央財政支出，將會造成分配不公平的矛盾進一步激化。

## 做到專款專用

第四，從法律層面看，目前我國社會保險立法存在很多問題。譬如：社會保險立法不健全，立法層次低，社會保險的法律實施機制較為薄弱，地方立法畸形「繁榮」，立法發展不平衡等等。正是由於沒有法律措施，社會保險法制建設滯後，才造成一些企業有機可乘，嚴重欠繳社會保險費。現在，如果開徵社保稅，以國家權力為依託，必然很容易徵收社保資金。但問題是，這「費」與「稅」的一字變化就能真正解決根本性問題嗎？顯然不能。誠如有學者所指出，如果社會保險部門徵收企業不願繳費，而稅務部門徵收時企業願意繳費，則說明企業是畏於該行政部門的權威，而並非是遵從國家的法律。第五，從管理層面看，能否做到「取之於民，用之於民」值得推敲。目前，不曬賬本的社保資金、屢屢傳出挪用、貪污的負面消息，已經使社保陷入了不被信任的尷尬境地。社保稅作為一種「專用稅」，在「個人信譽制度」尚未健全的情況下，如何做到專款專用存有疑慮。